

中外名人小传·第7辑

董必武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天安门



中外名人小传·第7辑

董必武小传

安国量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7辑

董必武小传

安国量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49—8/K·119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 一、植根在人民斗争的土壤中..... (1)
- 二、投身辛亥革命 (25)
- 三、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30)
- 四、在革命的大潮中 (38)
- 五、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到陕北 (55)
- 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 (64)
- 七、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
..... (84)
- 八、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支援解放战争 (88)
- 九、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 (92)
- 十、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 (105)

一、植根在人民斗争的土壤中

1840年英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奴役中国人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小农经济逐渐破产。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董必武就出生生长在这山河破碎、民怨沸腾的年代。

1886年3月5日（清光绪十二年农历正月三十），董必武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当地称这个家庭为“大井坎董家”。董必武幼名乐益，辈名贤琮，学名用威，字法清，号璧伍。“用威”，取自《尚书·大禹谟》中“董之用威”句；“璧伍”，取自《汉书·律历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句。董必武在参加辛亥革命前后，为了表示决心革命，故摒弃原号，用谐音“必武”。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化名为“碧吾”。后来，取《史记·儒林列传》所载董仲舒“下帷讲诵”，三年“不观于舍园”的故事，反其意

而用之，曾自称“窥园叟”。

董家原籍麻城，世代务农，清初分支迁居黄安，先世曾在黄安县南四十里的永和镇西傅董家村居住，后迁至石家塆。董必武前六代祖先董之模，自石家塆迁居城内。进城后，全家节衣缩食，供子弟入学攻读。自此，董家才开始有人读书。但因三代都无人获得功名，家境更加穷困。曾祖父董为霖决定弃儒经商，以少量股本在本县武家畈做酱园。祖父董其元，大伯父董基浚都以“董恒豫”这个招牌继承着酱园手艺。所以，在黄安乡里又称他们为“酱园董家”。由于物价上涨，开支增大，资金拮据，酱园再无法做下去，在董基浚时被迫歇业。

祖父生子女九人，家中无田无地，只有一幢房屋，全靠拼命劳作，节衣缩食才得以维持生活。到董必武出生后，董家已是一个近三十人的大家庭。祖父死后，整个大家庭由大伯父主持，大伯父为人谨慎正直，受到乡里信任，因而被委托分管黄安县府四十八会中的“大有会”的一部分册书。酱园停业后，大伯父买谷回来，用木碓碾成米出售。同时贩卖烟、纸、香烛之类土产。

父董基文，排行第三，号采臣，自幼读书，年轻时便教蒙馆，20岁进岁，是秀才。1894年科考时

得第一名，拔至府县（董州府），就府额办，因没有钱办，只补增生。所谓增生，就是增广生员，也就是无廪无职的秀才，是科举时代进学生员的一种名目。董基文教了一辈子书，教书，读书都十分认真。性情爽直，好打抱不平，鄙视趋炎附势的人，在社会上有耿直的名声。对子女要求严格，一向教子女“莫做坏事”。他同情革命，对董必武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反对。董必武因坚持革命活动而被捕坐牢，他更是四处设法，奔走营救。

四叔，董基明，号素怀，笔快而锋利，才名远扬。进学后曾补廪生，就是廪膳生员，是秀才中最高名目。董基明先以教书为职业，后用“恒兴福”的招牌在本县开杂货铺。

五叔，董基聪，又名基坤，号虞卿，先在“董恒豫”当学徒，后到汉口坐庄当店员，为人正直敦笃，能排难解纷，深受乡人敬重。

母，蔡氏，城市贫民出身，生二女四子。董必武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三个弟弟。蔡氏从小到董家做童养媳，是个典型的劳动妇女。为维护家庭生计，她买来籽花，经过轧花，纺纱，浆纱，络纱，织成土布，常常整晚不睡。她为人纳鞋底，一晚上即可纳一双，每双可收六十文。她对一针一线、一

草一木都爱护备至，绝不容许损坏、浪费。有一次，她发现厨房地面上有一粒饭，忙将饭粒拾起来，送到前庭喂了小鸡。这种热爱劳动，克俭克勤的作风，就是董家家风。这位勤劳的妇女，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教书、手工劳动、做小生意、当店员的收入，一直是董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帝国主义拼命在中国搜刮、掠夺资源，使物价飞涨。洋人的纺纱机到了武汉，新式机头比手工效率高，洋布倾销市场，小手工业很快被挤垮了。董家这个大家庭深深感受到这种变化，尽管克勤克俭，生活反倒更加困难，以至每天只吃两餐：上午一餐稀的（两碗）；下午一餐干的（一碗干饭加菜）。只有腊月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十五才能吃三顿干饭，才有点肉吃。清明、端阳、中秋的菜比平时稍好一些，遇上荒年，少不了吃野菜。这种困顿生活，使董家一家同贫苦知识分子、社会底层的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有着密切联系。

1884年至1899年，即清光绪十年至二十五年间，科举制度盛行，学堂尚未设立，大小城镇都只有私塾、书院、学舍或义学。一些有钱有地位的名门、贵族自立专馆，请名师来教授，聘请塾师的学俸特别优厚，每年多至数百吊。因董采臣、董素怀

文名噪甚，品学兼优，本县和邻县的许多名门贵族争相延聘，名人学士也都愿和他们结交。董采臣、董素怀从清末到民国初这三、四十年间，从不贸然为这类优厚学俸所动，春节期间归乡，从不到官府、各门去拜访，“唯以清贫自要，朴诚相传”。1919年，董采臣被敦请任县劝学所长，因不愿与他人同流合污，只干了几个月就拂袖而去。

幼年时代的董必武，在这种生活勤俭和作风朴诚的家庭里，受到了良好的熏陶。他的衣鞋，都是穿旧的，破了补好再穿；读的书，也是上一辈老人读过的旧书，破了裱好再用。因生活困难，从私塾放学回来，他常常去捡柴，拾野菜，有时还帮母亲搬送自织土布。由于从小就饱受艰辛，过着勤朴的生活，使他更加容易接近劳动人民，并能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从家庭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正直、勤劳、俭朴、诚实、笃厚、刚毅等品德的哺育，逐渐磨砺出自己“朴诚勇毅”的品格，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使他在那些恶习相袭成风的旧社会，能一尘不染。董必武对交朋友也注意选择，并以诚相见。对于轻浮不正之风，趋炎附势之态，不问其亲疏远近，即认为“非诚实人”，轻则劝阻，重则绝交，决不苟徇私情，随波逐流。董家与当地吴、孟两家

都有交往，吴家的吴兰垓与董必武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又是同窗学友，还有亲戚关系，但因其为人庸俗不正，董必武屡次规劝，他都听不进去，常为此而闹翻。孟家的孟龙荪虽然不是同窗学友，但因其为人老实，董必武和他的关系则比较密切。因此，“他的同学或朋友既尊重他，又害怕他，称他为‘畏友’”。

1915年11月13日，董必武在《曾大父行状》一文中写道：“自石家塆迁居邑城，产差足自给，世儒未显，唯朴诚相传。今吾家子弟，邑人多谓不类城市中人，盖先世已然也。”这种良好的家风，为董必武一生所保持。后来，董必武在创办武汉中学时还将“朴诚勇毅”作为该校校训。

董必武自幼聪颖慧敏。5岁时，父亲在黄安县城内东街广善庵教书，董必武常去玩耍。一天，父亲在广善庵之殿内考就读的叔伯兄弟背《三字经》，没有一个能背全，在门外玩耍的董必武大声代他们回答。父亲非常高兴，便要董必武开读《论语》。6岁时，董必武随父到离黄安县城三十里的李冕二村私塾，继续读“四书”。7岁时，父亲被聘到离县城更远的东张煜村张家家塾当塾师，因张家不允许带世

兄，董必武只得就学于四叔执教的城内易家私塾。后又随姑父读了一年。9岁时，父亲补为增生后，打算辞去张家塾师职，改教散馆，以便能教授董必武。张家不愿意董基文离开，便同意带世兄，于是，董必武转到张家家塾。10岁时，又随父到麻城张杰塈学塾就读。11岁回到本县，在故乡永和镇西傅董家村私塾读书3年多。1899年，父亲由傅董家村私塾转到黄安县城内董家家庙大福生寺旁的县办萃英书院任教，董必武遂于同年考入该书院读书，直到1903年初。

董必武勤奋好学，擅长文史，在学塾和书院读四书五经，策论之余，还博览读书。他学习了新学中的史、地、博物、算学，反复研读《古文尚书析疑》、《尔雅》、《说文》、《奥雅堂丛书》、《东莱博议》，还从父亲、叔父和有世谊之交的亲友藏书，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他很重视阅读史书，尤喜爱《左传》，《通鉴辑览》。有一次，借得一部《纲鉴》，书主限定一月归还。他用了28天，不但将书读完，还做了简要的读书札记。董必武深感这些学习“对下笔有帮助，一直受益”。

董必武对功名看得很淡薄，但在四叔和老师的催促下，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为了取得参加正式

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在黄安县应文童考试中，他屡列前茅。后来，在维新思想的冲击下，科举考试也改八股文，试帖改为时事策论。于策中抒发议论，董必武更为见长。他的恢宏的心胸，犀利敏锐的笔触，写出了不少新体裁的文章，受到老师、亲友的赞赏。1900年，黄安县新上任的县官，按当时的规矩搞所谓“观风试”，即由县官亲自出题，考试本县读书的子弟，以了解学风。

董必武作为童生，第一次以“用威”这个名字参加“观风”试，获得第二名。以后在县办萃英书院应月考，曾几次获得由县府发的奖赏和书院发的膏火（即津贴费用）。1903年县乡试之年。乡试前，先要举行县、州、府试，考中者为秀才。初入学的秀才叫附生，即附于廪膳，增广诸生员之后的生员。董必武在这一年元月应黄安县城和黄州府试，都榜上有名，获得附学生员，也就是考中了秀才。

在封建社会获得功名，是进入仕途的开始，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按黄安县城的老规矩，获得功名的人回来，乡亲邻里要在县城东门放鞭炮迎接，还要请客、送礼，表示祝贺。董必武不落俗套、不图虚名，对这套老规矩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中了秀才“没有什么了不起”，故意绕道回来，要父亲向亲

友、邻里说明，拒绝收礼物。他在入学以前，一直穿旧衣鞋；入学以后，因为按规定秀才要穿长袍子，才做了一件长袍和一顶帽子。当时交通不便，道路坎坷，旅途跋涉十分艰难。从黄安县城到董州或武昌，距离各有两百里左右，董必武往返都坚持步行，不因自己入学而有所改变。他到黄州应试是自己挑着行李，由黄安县城的倒水河坐木排经长江到黄州起坡，再挑着行李到考棚街，考中秀才后，董必武约几个挚友，依旧挑着行李长途跋涉，于同年8月到省城武昌应乡试。

董必武第一次受到群众斗争的实际教育是在他尚不满十岁时，1892年7月1日（农历5月18），发生了“麻城教案”。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为所欲为，官府却不敢触动他们一根毫毛。在麻城县宋埠镇的瑞典、意大利反动传教士，到处横行霸道，残害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当地农民百姓早已怒不可遏。以传教士奸占民女为爆发点，宋埠镇附近郝家铺的李金狗、徐全福等趁端午节看会的机会，将洋人传教士殴毙，为民除了一害。当时的反动官府认为打死“洋人”是罪中之最，要严加惩办。黄州府知府高尉光即按照斗殴例办理，湖广总督张之洞

特委候补知府裕庚驰往查办。仍照互斗例处以“绞监候”，即判处死刑中的绞刑，到次年秋审时再作出最后裁定。这件“教案”的处理前后拖延一年多。其结果是照例向洋人赔偿巨款，人民依旧含冤，教士更加凶狠。因而老百姓恨洋人，兼恨官吏。以郝家铺殴毙反动洋人的故事为题材编成的东路花鼓戏、皮影戏、鼓书等，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正在黄安、麻城学塾读书的董必武，听到李金狗、徐全福击毙洋教士的消息，高兴地拍着双手说：“太好了！”当清政府缉捕李金狗、徐全福，并处以极刑的消息传来，董必武气愤地怒瞪着双眼。他十分敬佩群众英雄李金狗、徐全福等的正义行为和勇敢精神，并“由此感到对洋人不满”，这种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开始播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王朝的火种，培植了人民不可悔的坚定信念。

董必武对麻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随父亲在麻城张杰塆读书期间，一次不慎掉到门前的小塘里，被当地群众奋力救起。董必武在这里亲身体验了劳动人民彼此间真诚的爱和对帝国主义者深切的恨。70年后，董必武在谈到“麻城教案”和张杰塆一段生活时，还说印象深刻。

1898年，黄安县爆发的农民抢谷风潮也教育了

董必武。这一年，黄安县发生了灾荒，农民没有饭吃。县城小八里湾，七里湾等处，都设有“丰豫仓”，虽然积谷很多，可是被土豪劣绅把持着。“全县的大地主每家包内却堆着隔年的陈谷，可是锁在包内不赀，愈是涨价，愈是奇货可居。平时的谷价，每石不过八百文，此时陡涨到两吊四百文，而雇农每年的工价才不过五吊，辛苦一年，只落得两石谷。农民无法生活，人山人海齐聚县正堂衙门请求设法救荒。县官巫国玉，是皮匠出身。因为他在藩台衙门做工多年，得到藩台的提拔，替他捐了一个知县。他出了告示，把谷价规定为一吊六百文一石，并劝谕绅士及富户照价赀谷，以救饥荒。这种告示，富户毫不理会，饥民赀不到谷，又闹到县衙。巫知县说：“他们存谷不赀太可恶了，你们抢！”有人说：“抢得吗？”巫知县说：“一家饱暖千家怨，怎么抢不得！”于是全县各乡，鸣锣集合，每人都挑着箩筐布袋，到大地主家抢谷。3天之内，所有“丰豫仓”和富户的积谷，都被一抢而空，劣绅地主岂肯干休，控告信象雪片一样拥向督抚和藩、府衙门呈送，说知县纵匪行动，全县大乱，请派县剿办，以安地方。有正义感、同情人民的巫知县，自然落得个撤职查办的下场。这件事，对少年时代的董必武也有很大的影

响。他开始看清了：土豪劣绅、封建官府，只知从农民身上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却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即使有一两个好官，也无法真正为人民做好事。20年后，董必武还用“黄安抢谷风潮”时的亲自感受教育武汉中学学生，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随着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官僚的矛盾日益激化，使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之中的董必武，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同情人民，见义勇为，爱国心和正义感更加增强。董必武入学前后，有两件事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清朝统治时代，董州府管辖黄冈、蕲水（浠水）、广济、黄安、蕲州（蕲春）、罗田八县。每逢考期，各县应试的廪生、增生、附生、童生不下3万人。1903年，湖北学政蒋武芬前往主试，不准考生携带书籍或抄本入场。董州八属廪增附生应府试的那一天，有一位广济廪生饶汉堯，进场时拒绝检验。那些狐假虎威的舍人及门卫，竟强行搜身，当众加以侮辱。饶汉堯喝道：“狗！士可杀，不可侮，你敢打人吗？”蒋学政正在点名，叱问道：“谁敢放肆，将他驱逐出场！”这时，恶役们本已把饶汉堯打得躺在地上，听得学政口令，一面喝道：“快滚出去！”一面用高底皮靴踢，因踢中命门，饶汉堯顿时气绝。事

后，蒋学政又指使抛尸灭迹，因而引起众愤。目睹这种悲惨情景，未满十八岁的董必武，义愤填膺，立即和麻城屈子厚、蕲州程柳塘同八属的其他廪增附生员和童生，包围贡院，封锁龙门，把贡院围得水泄不通。冤单和揭帖，布满墙壁。围了两天，里面的供应断绝，不能举火。知府是监临官，也被关在贡院，不能出来。事情太大，知县官不能作主，城守协带几个绿营兵也弹压不住，县官打揖打躬地苦劝，也没有人理他，以至闹得省抚台于荫霖派兵船两艘，满载军队，前往镇压。这场风潮闹到最后，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已远远超过鄙视功名，伸张正义的范围了。当时，在汉川门壁上就题有这样一首诗：

八属秀才进试场，
刀枪剑戟排两旁；
分明是个杀人场，
哪有心思做文章。
这个秀才我不要，
不如改脚去驮抢；
有朝一日起了事，
要把狗官杀精光！